

WENWUYANJIU 第十五辑

文物研究



黄山书社

文物研究

第十五辑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物研究. 第15辑/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合肥: 黄山书社,
2007.12

ISBN 978-7-80707-811-1

I.文… II.安… III.文物-研究-中国-文集 IV.K8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5178 号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

新华书店经销 合肥学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6 字数:6075 千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 册

*

定价:150 元

目 录

江淮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专栏

- 江淮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在合肥召开 (1)
- 国家文物局张柏副局长讲话 (2)
- 安徽省委宣传部黄传新副部长讲话 (4)
-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严文明先生讲话 (6)
- 双墩文化属于夷夏并立的夷族是形成汉族的最早来源与文明求源新思考
..... 黄盛璋(10)
- 安徽淮河流域的史前文明——双墩文化及其序列的初步探讨
..... 阚绪杭 周 群(29)
- 玉文化中心在文明化进程中的意义——从凌家滩遗址谈起 张得水(42)
- 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形态及其特征 王吉怀(48)
- 江淮地区早期文明进程的断裂与边缘化 宋 建(58)
- 江淮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考古学观察 杨立新(63)
- 江淮地区史前时期的文明化进程 何德亮(69)
- 凌家滩遗存与红山文化 田名利(79)
- 从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祭祀遗存看原始宗教的发展 陶冶强(91)
- 关于凌家滩墓地的分期与年代问题 杨 晶(101)
- 凌家滩文化墓地出土玉鹰工艺研究 陈启贤(109)
- 凌家滩“玉龙”小识 朱乃诚(118)
- 双墩和凌家滩纹饰沿革分析 张 捷(123)
- 安徽凌家滩古人的用玉观 朱勤文 张敬国 廖任庆 吴 沫(128)
- 氡氡同位素定年法在凌家滩文化玉器考古研究之应用
..... 周述蓉 罗清华 张敬国 贺云翱 张祖方 饭冢义之 那汝瑜 唐贵琳(132)
- 江淮地区出土“良渚式”玉器文化属性蠡测 殷志强(140)
- 登封王城岗遗址聚落形态再考察 方燕明(146)

考古发现

- 安庆市张四墩遗址 1980 年试掘述要 安徽省博物馆(150)
- 安庆市张四墩遗址 1997 年试掘新石器时代材料补遗
.....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58)
- 界首市张大桥土坑墓出土东周器物 界首市文物管理所(180)
- 重庆云阳县晒经周一清代遗址 2001 年春季发掘简报
.....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云阳县文物保护管理所(183)

霍邱县西南庄遗址与汉墓发掘简报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4)
六安市城东双龙机床厂 388 号西汉木椁墓清理简报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六安市文物管理局(212)
明光市张岗汉代、明、清墓群发掘报告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19)
当涂县新市镇东晋杨氏家族墓发掘简报	当涂县文物事业管理所(231)
肥东县清水桥唐—清代遗址发掘简报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肥东县文物管理所(235)
怀宁县青树嘴宋墓清理简报	怀宁县文物管理所(241)
繁昌县凤形村宋墓清理简报	繁昌县文物管理所(246)
舒城县鲍墩宋墓清理简报	舒城县文物管理所(250)
凤阳县薛庙北宋遗址发掘简报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55)

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

从霍山戴家院遗址看柱洞的发掘	卓识雨(262)
探方平剖图对不上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	武家璧(267)

文物研究

皖南商周青铜器装饰艺术	郭光(269)
谈异型青铜箭簇	李勇 顾岩 徐明飞(277)
李三孤堆楚王墓被盗掘及遗物的流传	陈小春(280)
六安汉墓综述	冯志余 万永林(284)
谈马鞍山地区六朝墓葬的分期及类型	栗中兵(289)
略说汉“隆帝章和时淮南龙氏”盘龙镜	许建强(296)
宿州市发现的汉魏铜镜综述	冀和 王磊(299)
淮北柳孜隋唐运河遗址出土秘色瓷	胡均(304)
怀宁出土宋代青白瓷执壶赏析	程夏玉(306)
新发现的南宋“和州行用”铁钱牌	汪本初(308)
“告”族器整理与研究	王长丰(310)
先秦夷族史料的汇总与考辨	夏麦陵(313)
阜阳汉简《周易》研究	连劭名(316)
“𠄎”字考	马尔昌(326)
关于古玉价值评估的几点思考	张宏明(327)
古人文坛用玉现象初探	李静(335)
略谈古代玉器发展及时代风格	江世杰(339)

古建保护与文物科技

天人合一的徽州古民居	王一婷(341)
徽州古民居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传统民居的比较研究	董松(344)

霍邱文庙	赵以华(348)
古建筑木构椽的应力计算	张 辉(351)
尉迟寺红烧土房烧成温度及相关测试研究	李乃胜 王吉怀 毛振伟 王昌燧(355)
六安双墩一号汉墓考古发掘现场的文物保护	袁传勋 徐 靖 姚政权 高 飞(365)
六安双墩一号汉墓出土青铜壶的初步保护	姚政权 袁传勋 李华清 张丽萍 杨立新(371)
六安双墩一号汉墓木俑前期处理	高 飞 张丽萍 李华清 袁传勋(374)
EDXRF 无损分析凌家滩玉器	徐 靖 袁传勋 姚政权 高 飞(378)
安徽省考古所文物标本室建设构想	郑 玲(383)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 促进旅游事业发展	程 蓓(386)
安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献目录	朔 知 张小雷(390)
重要启事	(409)

江淮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在合肥召开

2006 年 11 月 13-15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举办的“江淮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在安徽合肥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所、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文物报社、中国文物信息中心、文物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以及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博物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美国夏威夷毕士博物馆的代表共 120 余人出席了会议。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社联主席黄传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兼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巍、安徽省文化厅副厅长李修松、安徽大学党委书记陆勤毅、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等在开幕式上致词,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著名学者石兴邦、黄盛璋、严文明出席了开幕式。会上还进行了《凌家滩》考古报告的首发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安徽省文物局局长陈建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朱乃诚、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杨立新分别主持了会议。严文明在闭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王巍作会议总结。

大会收到论文和提要 40 余篇。会议以大会发言为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湖北、浙江、江苏、安徽等省的代表分别介绍了蚌埠的禹会村和双墩、天门龙嘴和笑城、长兴江家山、南京牛头岗等遗址的近期考古新发现和认识。代表们围绕江淮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农业经济形态和主要特征、原始手工业与工艺技术、文明化进程的特点、凌家滩遗址与玉文化遗存在文明化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江淮地区与周围地区文化交流及其对文明起源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会议期间,代表们还参观了安徽省博物馆新陈列,观摩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门为会议准备的安徽史前考古标本陈列。

(责任编辑 朔知)

在“江淮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

开幕式上的讲话

张 柏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各位专家、各位领导：

在这个金秋收获的季节，“江淮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现在开幕了。谨此，我代表国家文物局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

文明起源研究是一个国际性的重大课题。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文明发展，连绵不绝，传承至今，世所罕见。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因而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其发展模式，在世界学术史上一直备受关注。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在经济全球化、民族要复兴的现实背景下，对这一课题的解决越来越显得迫切和需要。新世纪伊始，国家适时启动了“中国文明探源工程”。毫无疑问，是时代赋予了我们这一重大历史使命。

文明起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对此大家要有清醒的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考古学首当其冲，前辈学者为此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今天，我们要在此基础上，加强学科合作和学术交流，重新审视和整合既有的文明理论和研究成果，以创造性的思维，敢于创新，积极进取，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文明起源理论和方法，科学而规范地开展工作，以事实说话，扎实有效，一步一个脚印，为揭示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弘扬传统文化精髓、振奋民族精神奉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千差万别。考古学研究表明，史前时期已逐渐形成了几个各具特色的文化区域。这些区域的文明化消长过程，是剖析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基础平台。安徽地处华东腹地，长江淮河横穿全境。自古以来，江淮地区就是东西南北文化交流、碰撞之地，人文荟萃，地上地下遗留的文物资源十分丰富。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安徽的文物考古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成就。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国家文物局根据苏秉琦等先生的倡议，开展了苏鲁豫皖先秦古文化区域考古调查和研究课题，当时我也陪先生们来过几次，在经费方面曾重点给予支持，由此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和收获；而先后发现、发掘的潜山薛家岗、含山凌家滩和蚌埠双墩等较有地方特色的一批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以其文化内涵丰富、新颖，引人注目。尤其是凌家滩遗址出土大量器形独特、制作精美的高规格玉器，如玉龙、玉人、玉龟、玉版、玉钺、玉

戈等,为认识、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信息。这些成果就是这一远见卓识的体现和深化。因此,举办这个区域文明化进程研讨会不仅是很有必要的,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通过这次研讨会的成果展示和检阅,国家文物局将总结经验,视具体情况继续给本区域的文明探源课题以重点关注和支持。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文明探源课题前一段时间在科技部的主持下,通过了专家论证,已被批准确定为国家“十一五”计划的重点课题。现在,我们正在组织落实这个课题,安排参加的单位、专家,然后“十一五”期间要抓紧时间做好这个课题。非常希望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理论联系实际,考古结合文献,发挥多学科优势,对江淮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及其特点,以及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的作用和地位等问题,畅所欲言,发表创见,凝聚共识,谱写华章,以你们的辛苦和智慧,推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工作向前迈进。

祝大家身体健康!

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根据 2006 年 11 月 13 日会议讲话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责任编辑 朔知)

在“江淮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

开幕式上的讲话

黄传新

(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社科联主席)

各位来宾、同志们:

“江淮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今天在三国故城、包公故里——合肥隆重召开了。首先,我代表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和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向与会的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欢迎,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不久前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下,大力建设和谐文化。和谐文化既是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撑,也是衡量社会和谐水平的重要尺度。而和谐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开展中国文明起源及发展的深入研究对于加强历史遗产遗迹的开发利用,发掘民族和谐文化资源;对于弘扬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促进今天的和谐文化建设及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文明的起源涉及到中国社会历史分期、涉及到中国古代阶级和国家的形成、涉及中国先秦史的发展模式等重大问题。因此,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研究,一直是我国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重大课题。近年来,随着大批考古发掘新成果的面世,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日趋活跃。同时,有关文明研究理论方法的形成与创新,以及多学科的加盟,都大大丰富了文明研究的内涵。文明探源正呈现出方兴未艾的生动局面。

安徽江淮地区地跨有中国古代“四渎”之称的淮河、长江,既是沟通南北东西的交通要道,又是黄河长江流域两大文明的交流碰撞的地带,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区域之一。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这一地区发现的距今 7000 年以来至汉代以前的一系列文化遗存,包括双墩文化、含山凌家滩、薛家岗文化以及含山大城墩、寿县斗鸡台等,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地区以及整个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在中国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之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的这次研讨会,对于进一步推动江淮地区文明起源研究,探讨江淮地区文明化进程和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及其在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我们安徽省历来重视地方区域文化和传统文化研究,在省委下发的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实施意见”中,对加强地方优长学科和传统文化的研究提出了明确要求;在全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把区域文化、传统文化和安徽考古新发现研究列入规划课题指南,进行资助。近年来,我省学术界还围绕古代文明研究,与国内外有关学术机构合作,先后成功举办了比如淮河流域历史文明研讨会、皖江文化研讨会、蚌埠双墩文化研讨会、青铜工业与早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一系列学术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动安徽的学术研究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次召开的以“江淮地区文明化进程”为主题的研讨会,是一次重要的全国性学术会议,许多代表都是这一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会议期间,代表们将观摩安徽出土的文物标本陈列,交流本省和周邻地区的考古新发现,研讨江淮地区考古学文化和古代文明化进程等新成果,这是对我省早期文明起源阶段性研究成果进行检阅和展望的一次盛会!我们相信,在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下,本次研讨会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会议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必将大大推进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课题的深入开展,必将为弘扬民族精神、推进中国和世界学术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谢谢大家!

(根据2006年11月13日会议讲话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责任编辑:朔知)

在“江淮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

闭幕式上的讲话

严文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教授)

这次会议主题是江淮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做文章要切题,我想就这个题目谈一些自己的看法。先谈一下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基本情况,因为研究江淮地区文明化进程的问题,固然要分析江淮地区的有关资料,但是要把问题说清楚,还是要放到全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大背景下来进行认识和讨论。

中国文明研究的热潮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我记得在1985年,夏鼐先生把在日本发表的几篇演讲编成了一本书,题目就叫《中国文明的起源》。夏先生是一个很严谨的学者,他不到一定的时候不会提出什么新的看法。他在书里面是从殷墟的发掘开始讲起的,说在殷墟经过发掘以后证明商代晚期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然后向前追溯,到50年代,郑州商城的发现证明商代的前期也已经进入文明时代。再往前追溯到二里头文化时期,二里头遗址的那些遗迹和遗物表明那个时候也应该进入文明时代了,至少二里头文化的晚期是这样。然后,他又讲文明的起源和文明的形成不是一回事,文明的起源还应该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去追寻。他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并不是没有一点根据,因为在这之前有大汶口文化和陶寺文化的发现,两者从墓葬看贫富分化和社会地位的分化已经非常明显,跟一般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看到的人人平等、物质文化非常简单的情況有点不一样。80年代初,又有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中十分壮观的“坛、庙、冢”和甘肃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的所谓“原始殿堂”的发现,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所以夏先生很明确地讲中国文明起源应该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去追寻。从那以后,中国一些地方有关文明化时期的遗存不断发现。1986年、1987年在良渚文化遗址群里的反山、瑶山贵族坟山中大量精美绝伦的玉器和漆器等物的发现,引起学术界普遍的关注,甚至是很大的震动,没有想到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中会有那样高规格的墓葬和随葬物品。人们纷纷议论:到底良渚文化是走近了文明时代的门口,还是已经进入文明时代了呢?这时期另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在各地不断发现史前的城址。在湖北天门石家河发现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城址,面积达120万平方米,里面有很明确的功能划分,说明长江中游也正迅速走向文明化的进程。所以,1989年在长沙召开的第七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苏秉琦先生做总结发言时就明确提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中国考古学界的任务之一就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当成一

个头等重要的任务。苏先生很早就关心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和文章。他的观点集中反映在1997年出版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这本书是苏先生口述、由郭大顺先生记录整理的。书中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三条:第一,中国文明是多元起源而不是由某一个中心起源然后向周围扩散;第二,既然是多元,在各地文明化进程的内容和方式是不一样的,各有特点,所以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时既要有宏观的把握,又应该研究各个文化区系的具体情况。第三,以中国之大,各个地方文明化的时间有先有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比较靠前,在那里首先产生了夏商周文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后来也陆续建立了自己的文明。这些文明从来不是彼此孤立而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组成一种多元一体的结构,这种结构乃是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中国的基础。我觉得,苏先生以上的观点对于今天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应该具有重要的参照和指导意义。

现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热潮正方兴未艾。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想用更大的力度来支持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启动了“探源工程”。可以看出,我们现在的工作是有相当基础的,也是有理论指导的,不是从头开始,不是前人没做过工作,现在突然来个工程让大家去做。

探源工程之前,有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原有班子曾经做过一些探源工程的预研究,而且当时就打算基本上由这个班子把探源工程继续下去。我们当时觉得夏商周断代工程只是一个断代的研究,内容比较单纯,过去的研究也有比较好的基础。而所谓探源,就是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性质完全不一样,研究的内容复杂得多,年代更久远,地理范围也广阔得多,又没有多少古文献或古文字的资料可作参照。所以,像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组织形式恐怕不合适,也不利于发挥全国各单位和各位学者的积极性。因此,我们当时提议这个项目要吸收各有关方面的力量参加,各个单位、各位学者,只要是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都可以申报。当然,还要组织专家来审查你的申报,如果合适的,就应该支持。为了保持公平和公正,专家组的成员虽然可以有自己的研究,但不得申报项目。现在基本上是采取这种方式在运作。鉴于文明起源的问题非常复杂,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泛,短时期内不可能完成,甚至也很难说在某一个时期内取得某种明确的阶段性成果。探源应该是一个永恒的课题,而不是一个可以一蹴而就的,只有某些具体课题才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完成。用工程的方式来操作不见得好,我一直不赞成叫什么工程。不过叫什么名称也没有多大关系,只要国家支持,大家努力,至少可以加速这一课题的进行。

江淮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乃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组成部分。江淮地区不限于安徽,但主要在安徽。讲江淮地区文明化进程主要是研究安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过程。在这个会上提供了很多资料,说明安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有不少新的发现,研究也有很大的进展。但是,说实在话,比起周围的山东、江苏、浙江、河南等考古强省来,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也许我了解的还不够,但愿这个说法不很确切。

安徽比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如小山口、石山子、双墩和侯家寨一期等这样的遗存,究竟是一个考古学文化,还是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它们之间的早晚关系和文化关系如何,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晚一点的遗存有三块:一个是皖北,以尉迟寺遗址为中心的一类遗存,应该是大汶口文化在皖北地区的一个地方类型,现在做了不少工作。之后是一些相当于龙山文化的遗存,面貌比较接近王油坊类型,但工作做的并不太多。第二个就

是江淮地区的西边,以薛家岗遗址为代表的薛家岗文化这类遗存,也做了不少工作。尉迟寺出了一本考古报告,薛家岗也出了一本报告。第三个就是江淮地区东部,以凌家滩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现在《凌家滩》报告也出来了。这三类文化遗存之间是什么关系?好像薛家岗文化和凌家滩文化比较接近,应该是江淮地区的主体文化。尉迟寺一类遗存则是另一个文化系统,其发展水平远不如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中心地区,文明化的迹象也并不显著。

江淮地区文明化进程,从薛家岗文化和凌家滩文化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薛家岗文化主要分布在安徽西部的长江北岸,长江南岸和湖北东部也有少量遗址。其中心遗址薛家岗面积不过 10 万平方米。从墓地情况看,早期(第一至第三期)都是小墓,看不出有分化的迹象。中期(第四、五期)出现较大变化,晚期没有发现墓葬。其中第四期个别墓随葬较多石器和少量玉器。第五期才出现几座较大的墓葬。如 M44 随葬陶器 3 件、石器 9 件和玉器 33 件,石器中有多孔石刀和画花果纹的石钺,玉器中有钺、钺、璜和管珠等,超出一般墓葬的规格。应该说这个时候已经迈开了走向文明脚步。但薛家岗遗址的中期无论从器物特征还是从碳 14 年代来说,都已经相当于良渚文化的时期,而文明化的程度却远远不如良渚文化。相比之下,凌家滩文化就发达得多了。

关于凌家滩文化,这次会上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是玉器,包括玉器的质地、产地、种类、形制、纹饰的解读及与文明起源的关系等各个方面都谈到了。我还是谈谈本行,想从遗址本身做一些观察,看看凌家滩到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这也就是我在《凌家滩》报告序言中谈的内容。我注意到凌家滩是一个大的遗址,是一个 100 多万平方米的遗址,在安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对这个遗址基本上没有做全面的勘探和发掘,只做了些试掘,发现有大面积的红烧土堆积,估计是大型房屋的遗迹。其他情况并不清楚。墓地有两个,其中一个做了全面揭露,这提供了我们分析的基础。墓地有不同的层位,墓葬之间有复杂的叠压打破关系,但是要分期却很困难。一则是随葬的陶器较少,有些陶器又难以修复,不大好进行全面的类型学研究;二则也说明前后经历的时间并不很长,从陶器和其他器物上看不出明显的规律性变化。如果从平面来看,好像能够比较明确地分成几组。这种情况到底只是表面现象,还是反映一定的社会内容,则需要做具体的分析。我注意到,每一墓组中早晚的墓葬的性质都差不多,说明墓组的划分不是随意的,从早到晚是比较稳定的。具体而言,墓地的南区是大墓的集中区,从早到晚都是如此,一些重器也出于此处。很明显,这个地方在墓地中占有很特殊的位置。西南、东南、西北的墓葬规模稍小,是第二等级的。但是,西南、东南的墓组,好像宗教性质比较浓,西北墓组从早到晚好像都是石匠、玉匠,墓中出了许多石器、玉器以及石料、玉料。东区的墓,陶器出土比较多一些,其它东西不太多。中区的墓则比较穷,而最穷的是北区的墓葬,规模小,随葬东西也最少。每一个墓组的墓葬数目不多,应该只有一个家族的规模,是一个家族在一定时期死亡者的墓葬。整个墓地的规模也不是很大,最多是一个氏族的规模,是一个氏族在一定时期内死亡人员埋葬的墓地。如果这个估计不至于大错,就说明在凌家滩时期氏族内部发生了分化。有比较富的家庭,代表社会的上层;也有比较穷的家庭,他们是社会的平民。在职能上也有分工,有的是宗教人士,有的是军人,有的是工匠。这种分化正是社会文明化过程中的重要表现。

凌家滩墓地的年代大致相当于薛家岗文化的早期,而发展水平远高于薛家岗文化。

可见江淮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文明化的进程在东西两边有很大的差别。不但如此,即使在全中国的文明化进程中,凌家滩也是起步比较早的,在同时期文化中是发展水平比较高的。但是,为什么以后在安徽看不到其更进一步的发展?我想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考古工作还没有做到,一个是文明中心的转移。

中国史前文化有不同的区系,几个大的区系文化的发展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像山东及其左近的海岱文化区,从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一直到岳石文化,都是前后相继,稳步发展的,还不时对邻境文化有所影响或冲击。到商代华夏势力才大举东进,到周代建立了齐、鲁等诸侯国,也还保持当地文化的许多特点。中原地区从裴李岗文化(以及白家文化)、仰韶文化到中原龙山文化,一直是强势文化,也是前后相继,稳步发展的。以后便成为夏商周三代的重要舞台。长江中游的两湖文化区,从彭头山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也是前后相继,稳步发展的,之后发生一些曲折,但深厚的文化底蕴并没有消失,所以到周代又出现了强大的楚国。江浙地区的情况也大抵如此。文化底蕴厚了,不是随便就会消失的,中间或许有一些变化起伏,但是在一定的时期还是会起作用的。

在几个大的文化区系之间还有比较小的区系或亚区系,江淮地区特别是安徽应该属于这种情况。亚区系或小区系的稳定性较差,容易受大区系强势文化的冲击,往往变化比较大。凌家滩文化中心的转移,或许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

关于江淮地区特别是安徽的文明化进程,我们现在的认识仅止于此。至于如何开展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我想提几点意见,不见得合适,仅供参考。

第一,要优先抓紧弄清楚江淮地区的文化区系。现在文化分区多少有些眉目,但是各个小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多不清楚或不完善,在文化分期基础上的谱系更做得不够。只有薛家岗文化的研究算是开了个头,也还没有完全解决。因此,首先要开展普遍而深入的考古调查,并适当地进行一些试掘,把各地文化分期搞清楚。这并不是很难的,但要定下心来认真去做。

第二,在基本上弄清楚文化谱系的基础上要找一些重点遗址进行发掘,包括在基本建设工程中发现的重要遗址。要改进发掘方法,严格按照经过修改的田野考古操作规程办事。要有聚落考古的意识,通过聚落形态演变的研究来扎扎实实探索江淮地区特别是安徽的文明化进程。

第三,要加强科技考古的投入,开展多学科合作,以便尽可能多地提取文明化过程中的各种信息,使研究的结果有血有肉,有立体感,而不只是干巴巴的几条。

第四,要加强与各个地方和各个考古单位的联系。因为邻近几个省相关问题的考古工作和研究都有不少值得安徽的同仁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当然你安徽做得好的地方人家也要学习,相互交流沟通总有好处。如果从这几个方面进行努力,我想江淮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将会有更大的进展。

(根据2006年11月14日会议讲话录音整理并经本人修改)

(责任编辑 朔知)

双墩文化属于夷夏并立的夷族 是形成汉族的最早来源与文明求源新思考

黄盛璋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一 双墩文化在中国文明求源上巨大价值、与历史地理考古学初步考察总论

(一)双墩文化是近年在安徽淮河流域新发现的一种新石器文化,从 1985 年文物普查发现后,经 1986 年地方抢救性发掘,1991、1992 年安徽文物考古研究所两次正式发掘,基本确定地层与文化特征,经文物考古界讨论研究定名为双墩文化,碳 14 测年为距今 7300—6500 年,遗址发现有粃、粃水稻壳、农业生产工具,与饲养家猪等畜牧业。按我主张:生产食物(包括家畜)的“农业革命”产生,就是进入文明史的决定标志^[1]。何谓“历史”?我以为历史学所称的历史就是人类文明史,而与人类史、自然史、地质史、以及古地理史等明确区分开来,而其分界线与起点就是改造自然、开始生产食物、家畜的“农业革命”,所以就是历史科学特别是历史学与其相关学科时间的上限和研究开始,同样也是历史地理的时间上限,从此开始,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发展过程,按我提倡历史地理考古学,还要包括研究未来发展,考虑今后出路,应走何一道路?方向、方法、中心问题还是中国文明发展,必须包括过去、现在与未来,作为最大任务,重心是过去,而以现在为立足基础和出发点,上溯文明源流、演变,下推其未来发展的方向、出路,可能的预测、预计、预防。本文就是用我近年提出的历史地理考古学理论、观点、方法研究所得的初步结果,能不能成立?必须先对所用理论、方法根据,作出如下必要阐明。

(二)中国过去的历史地理研究,原作为史学的附庸,传统称为四把门钥之一。现代科学的历史地理学从提出至今,经历半个世纪,正在建成之中,理论、方法、手段、领域作为科学成长的标尺来衡量都还不完备,所缺甚多,单就最基本的研究时间上限,亦即从何时何处起点?研究什么?迄今就是一个没有正确科学解答的一个根本问题。传统的历史地理研究都是文字记载的历史,现虽理性认识到必须打破这一限制,但是一到研究实践,绝大多数仍都不能脱离文字记载历史之窠窝,无法突破,关键就是在没有找到、也提不出无文字的史前研究理论、方法、道路。近年我提出建立历史地理考古学研究,明确规定这一时间上限,必须以文明起源的农业革命为起点或上限。出现农业就要定居,人要居住,出现村舍,就有地名,人文地理与其分布现象随之产生,所以就是地理的萌芽、与其认识的

开始,随着时间发展,出现地名变迁,从而产生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知识与研究需要,二者原合一不分。班固《汉书地理志·序》:“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而成《地理志》,以汉地理为主,包括历史地理,合二为一,明确交代历史地理产生原由就是由于时间推移,地名改易,何等明白!所以我提出历史地理学时间上限即始於定居的农业革命,非常有理有据;而更为重要的是:历史地理学与历史学不同就在于,历史学研究人与社会关系,而历史地理学研究人与地的关系,司马迁作《史记》,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天人之际”就是人与地关系,亦即人与自然关系,“通古今之变”就是研究历史发展规律,这两条就是创建历史地理考古学研究根本任务与最高悬鹄,中心就是人地关系,既要研究地,也要研究人,而其目的、任务,既不是地,也不是人,而是要通过人的关系来改造自然,人类真正改造自然就是从农业革命开始,所以历史地理学也必须从农业革命为起点,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否则仅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为上限,最多只能有四五千年,人类改造自然的历史至少一半以上都丢在外,历史地理主要只能研究后来一小半,严格地说,只能算是半部历史地理研究,不是全部,不管后半如何重要,丢去前半,“天人之际”与“古今之变”,也都只有一半,失去规律研究,就根本无法“究”与“通”了。所以我集思数十年,唯一就是建立历史地理考古学,才能补救历史地理学研究缺陷,一来历史地理学时间上限应和考古学基本相同,过去不能研究的前半,恰好就是考古学研究范围,必须依靠考古学研究;二来不论在发掘、断代、微观考察等都要利用、依靠考古方法及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考古发掘限于微观,宏观是发掘不出来的,然而恰是历史地理考察、研究之长,考古学也要依靠历史地理,所以建立历史地理考古学就是长短互补,相得益彰,上限时间就是全新世约一万年前后,从而研究的时间范围、问题的领域、比之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扩大二、三倍,研究手段、方法、方向、道路,特别是指导思想研究的理论、方法,都要随之有很大程度差异,甚至是根本改变。首先就要转换指导研究思想理论,增加新的方法、手段,除考古外,还需要多种科技方法配合,都是过去历史地理研究不知,从未利用,不懂如何使用,尤其属于史前研究各任务,皆为过去不敢问津,无从看出和发现问题,没有新的方法、手段、理论、观点指导,即使出现重大价值问题,既是摆在面前,也只能望洋兴叹,无法涉足。即以双墩文化为例,不能不算淮河流域史前较早文明,它就是淮夷文化的前身和上源,既是考古,也是历史地理问题,它对两方面研究提供资料价值和问题都是重要而且关键,但是缺乏文字记载,按过去历史地理学根本不能研究,而单纯用考古发掘微观研究,或是历史地理宏观研究,首先就难发现关键何在?真相为何?如何才能深入内部,去伪存真,把唯一的揭露出来?除要利用考古资料外,就要依靠微观与宏观结合的观点、理论、方法,指导研究,才能发现、解释。本文主要就是利用这一理论、观点,揭出问题关键与症结所在,不论对历史地理学或考古学研究,至少多开辟某些方向、方法、道路,特别就研究的指导思想、理论、方法的原则说,从长远发展看,应该是永远能利用的。由于本文第一次利用新建历史地理考古学,讨论双墩文化属于试创,过去没有,所以有必要详细讲明,否则就将不能被理解,认为“痴人说梦”,此亦妄人与妄说而已矣。

(三)双墩文化是原始淮夷文化,没有任何文献记载,虽属于历史地理研究范围,如缺乏手段、观点,就无法问津。目前考古发掘资料还是比较有限,单是利用考古方法,材料就很不夠,无法决定其族属关系、源流变迁。考古限于微观,更是无法考察来源、发展,考古